

谷 宇 著

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

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体系内的
制度博弈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谷 宇 著

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

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体系内的
制度博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体系内的
制度博弈/谷宇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724-1

I. ①资… II. ①谷…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9656 号

责任编辑 熊捷

封面设计 郝楠楠



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

——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体系内的制度博弈

谷宇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80,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724-1/D·2604

定价 38.00 元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2年度中青班课题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求助于人者也。上者辅德，次辅事。天下之事谁为政？曰二显二隐。何谓显？曰三公统六部，六部各统其曹，是谓内之显治；以司道察守令，以督抚察司道，是谓外之显治。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迹不见者也。”

——清·韩振《幕友论》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基本理论:制度的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 / 11

第一节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 11

一、规则与制度 / 11

二、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 / 17

三、共生与竞争:非正式制度与规则体系和正式制度规则
体系的主要关系 / 22

第二节 制度资本积累与制度权威竞争 / 26

一、制度资本积累的涵义 / 26

二、制度权威竞争的衡量标准——“社会—文化”人群的多数
选择 / 30

三、人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选择及人与制度的双向
资本积累 / 33

本章小结 / 35

第二章 帝国官僚制度的正式制度资本积累过程及制度缺陷 / 36

第一节 庞大的帝国官僚制度的正式制度体系 / 36

一、官僚群体与官僚制度 / 36

二、正式官僚制度资本积累的过程与方式 / 56

第二节 帝国正式官僚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缺陷 / 66

一、制度理念与制度转型:帝国正式官僚制度核心价值的缺陷 / 66

二、制度习惯与制度效率:帝国正式官僚制度在运作中的缺陷 / 72

本章小结 / 92

第三章 帝国非正式制度资本积累过程及其影响的案例分析：

权制度与潜规则 / 93

第一节 帝国的权制度及其作用 / 93

一、权制度的涵义 / 93

二、补充与侵蚀之间——权制度的功能与作用 / 97

第二节 潜规则及其对正式制度的侵蚀 / 115

一、重新定义潜规则 / 115

二、潜规则生成的基本环境及特点作用 / 118

三、帝国官场的政治潜规则与帝国政府行政运作过程中的 主要潜规则 / 123

本章小结 / 158

第四章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竞争与制度资本积累 / 159

第一节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竞争 / 159

一、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内在冲突与理性人的选择 / 159

二、非正式制度资本积累的主要逻辑 / 166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的胜利：帝国正式制度体系的解体与衰落 / 170

一、科举制度失效 / 170

二、政府运作成本激增与效率递减 / 176

三、地方绅士调节机制的变质与地方绅士集团的衰落 / 179

本章小结 / 183

本书结论 / 184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现实生活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离不开社会,也离不开国家,既受制于社会,也受制于国家。社会因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起,国家因社会发展而起。人首先组成社会,为了组织起来的社会能够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人们才建构国家。国家在社会基础上形成。社会创造国家的目的,是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自身的秩序与安全,因而,社会既需要国家这个外在的力量存在,同时也需要控制这个外在的力量,以免社会被国家这个外在力量全部吞食,为此,社会设立制度以约束国家。国家产生的使命是治理社会,为此,国家也需要从创造秩序、治理与安全出发,建构用于规范人与社会的制度。从社会出发用于控制国家的制度与从国家出发用于治理社会的制度的有机组合,就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显然,这种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国家制度不是从两种取向出发形成的制度的叠加,而是国家与社会两大力量、两大意志交互作用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国家与社会协调与契约的结果。马克思说:“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契约。因而,法律不能决定使两种势力中的哪一种,即国家制度的哪一个部分有权改变国家制度本身,有权改变整体。”^①

既然如此,那么现实存在的任何国家制度,都不是制度部件的叠加与组合,相反都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各项制度部件的功能和意义,并不取决于部件的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个国家制度的内在使命和政治逻辑。正如所有的树木都有枝桠和树叶,而所有的枝桠和树叶的形态与功能,不取决于枝桠和树叶本身,而是取决于树木本身。国家制度是在国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协调中成长起来的，其内在的使命和逻辑通过其制度的整体来体现，其中既勾联起国家与社会，又同时支撑着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构成国家制度体系中的轴心制度，它犹如树之主干，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制度之树”，在抓住社会的同时，也撑起国家。由此可见，轴心制度的强弱、存废，不仅关系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的健全程度与运行成效，而且关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一个民族的兴衰与存亡。

在笔者的拙作《轴心制度与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政治学解读》一书中，笔者着重描述了轴心制度的特征及其重要作用，并且以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为例对轴心制度进行了具体研究。笔者对轴心制度的瓦解和变迁的研究，遵循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将制度变迁的原因归结为既存的制度偏见引发的潜在冲突；或者是旧制度在新环境下，由于外部的影响与压力引发的制度主体改变权力结构的企图。在研究中，笔者将帝国官僚制度的解体归结为西方文明的冲击引发内部政治改革的失败。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往往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我们不禁会追问：作为帝国轴心制度的官僚制度体系崩溃的内部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又是怎样导致了轴心制度体系的解体呢？

二、理论框架、主要概念与研究意义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制度体系的内部找原因。任何现存的制度结构都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同时，任何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都体现了制度设计者的偏好，而制度设计者在制度设计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偏好体现出来。而这些偏好恰恰是制度设计者利益与价值的体现。同时，由于制度设计者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能力局限性，也使得制度会在某些方面产生缺陷，具有不完善和不平衡的特征。因此，制度在设计伊始便天生地具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制

度结构中便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共生性。这里,正式制度代表一种公正性或公益性,是制度设计者意图的主要表现;而非正式制度则是制度设计者在制度设计中缺陷的表现或是其他意图的表现。因此在一种制度结构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往往是客观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度体系往往代表了制度设计者也就是占有有利地位的集团的利益,而非正式制度则代表那些不占有有利地位的集团的利益。这正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在解释制度变迁时谈到的所谓“既存的制度偏见”。但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既存的制度偏见是如何引发制度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的。笔者认为,制度结构内部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矛盾正是制度偏见的集中表现。

那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又是如何冲突的呢?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引入了制度资本积累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所谓制度资本积累是指:在一定历史时空内,在制度运作的过程中制度权威的增强,制度效用的增大,制度影响力增加。其中,制度资本积累往往受到制度行动者即“文化—社会”人的选择的影响。

由于人类生活的特性使然,一个“社会—文化”人的各种社会活动需要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法规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习俗、惯例共同构成了理性人行动的制度环境,并对人的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理性人行动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人的利益诉求,制度框架的存在不仅限定了人们利益诉求的具体标的,也限定了人们实现个人利益诉求的路径与方式。如此,人既要服从正式制度的安排又要遵守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于是,由于人的不同选择,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体系之间必然形成一种客观的竞争。人既可以优先服从正式制度的权威,按照正式制度的规范行动,也可以优先服从非正式制度的权威,遵行非正式制度的守则。人对于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权威的服从,势必造成两种制度之间的一种有关制度权威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被形象地描述成一种制度的资本积累过程。即,如果理性人遵守正式制度的安排、服从正式制度的安排,那么正式制度便得到一次权威资本的积累,进而对其他理性人产生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又会促使更多的人服从正式制度权威,使得正式制度得到不断的认同与复制,正式制度的资本积累就不断丰厚。反之,则非正式制度资本积累就越丰厚。制度资本积累的丰厚程

度意味着，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领域内，这种制度对人的影响更大，地位更主流，更具有生命力。而那些制度资本积累失败的制度便逐渐地不再被人们所遵循、认同，势必走向断裂——解体、转型或消亡。

实际上，制度资本积累是一种双向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方面，人遵守制度，制度的权威得以维系，制度得到认同与复制，制度本身得到了权威的积累。另一方面，遵守制度的人从制度中获取到了想得到的利益及价值追求，得到了利益和价值追求的积累。为了获得更多可持续的利益与价值，人便会更好地遵守这种制度的规范，进一步强化制度权威。因此，制度的资本积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的利益价值积累与制度的权威积累的双向资本积累过程。人的利益积累会促使人进一步遵守制度进而强化制度权威；而制度权威的高度强化也必然进一步限制人们更加严格地遵守制度规范，否则必然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甚至中断利益积累的过程。如此便达到一种人与制度为了利益与权威展开的互相强化的互动过程。相反，如果制度无法实现人的利益诉求，人便会选择遵行另外一种能更好地实现其利益价值积累的制度体系，而原有的制度权威将被轻视、遗弃，甚至遭受挑战，制度的权威日益下降，制度影响力日益减弱，制度将走向解体、转型甚至消亡，制度在竞争过程中惨遭淘汰。

在这种假设下，制度间的竞争便可以解释为围绕强化制度权威进行的制度资本积累的竞争。那么帝国官僚制度体系内部的冲突也就可以解释为官僚制度体系内部正式制度体系与非正式制度体系之间围绕制度权威展开的制度资本积累的竞争。

本书的研究由于受到笔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在具体的研究对象选取时，截取了清代官僚制度作为例证，具体地分析清代官僚制度内部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及其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清代官僚制度的发展已经达到顶峰，制度体系完善而丰富；第二，清代也是传统官僚制度的衰亡期，从历史学的研究出发考察官僚制度的彻底崩溃是最为合适的。

因此，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有二：

第一，有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的研究，即制度资本积累和权威竞争的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制度主义中既存制度偏见引发的潜在冲突，并丰富发展了制度内部冲突形式的研究。

第二,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的研究,即制度资本积累和权威竞争的理论假设来具体剖析帝国官僚制度体系崩溃的内部原因,进而对晚清帝国官僚制度转型失败做出新的解释。^①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

提醒制度设计者或制度维护者必须注意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政治影响与作用。一项制度作用的发挥往往是其内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妥协的结果。同时,在发现非正式制度作用日益增强时需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制度改革;或是完善与修补正式制度的漏洞,或是遏制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放任制度间的权威博弈与资本积累竞争,很可能导致制度体系的崩溃。

三、相关文献综述与研究资料

由于本书的研究延续了有关轴心制度的研究,因此,在文献的参考过程中,以有关轴心制度的研究为基础的同时,又增添了有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有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制度主义研究领域。非正式制度的最早提出者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正规约束’(例如规章和法律)和‘非正规约束’(例如习惯、行为准则、伦理规范),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性’。”^②在诺斯看来,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他又指出: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制度安排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的一小部分,

^① 过去对于晚清官僚制度体系崩溃仅仅简单地归结为政治腐败,而究竟政治腐败如何腐蚀制度体系却缺乏研究,尤其是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体系冲突的理论视野进行研究,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② [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页。

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①。作为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对经济绩效产生巨大影响。但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正式制度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而易忽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目前对非正式制度作用做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对两者关系研究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在国外，Masahiko Aoki 发展了一个相机治理 (contingent governance) 模型，并显示相机治理的有效性可以由互补的制度安排来得到提高^②。Pargal and Wheeler 分析了正式制度缺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并提供了印度尼西亚的经验^③。Avner Greif 运用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中世纪晚期的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传统(非正式制度)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正式制度)的选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研究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影响的一个有力的例证^④。Martin Raiser 认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他集中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并且初步分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⑤。Ayse Pamuk 基于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 (Trinidad and Tobago) 的实证研究，指出合作的非正式制度通过降低交易费用、风险和提供对付不确定性的机制，促进交易，因而可以替代正式制度。^⑥

国内学者孔泾源认为，意识形态是我国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

① [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23 页。

② Aoki, Masahiko: "The Contingent Governance of Teams: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4, Vol.35, No.3.

③ Pargal, Sheeli and Wheeler, David: "Inform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Vol.104, No.6.

④ Greif, Avner: "The Organization of Long-Distance Trade: 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the Geniza Documents and Genoa During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1, Vol.51, No.2.

⑤ Raiser, Martin: "Informal Institu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Reflections on a Neglected Dimension"[Z]. *Working Paper,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7.

⑥ Pamuk, Ays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Credit, Land Markets and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in Trinida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Volume 24 Issue 2, (June).

我国数千年的文明进化所形成的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则或非正式制度安排,既造成了我们制度变迁的某些困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深厚土壤^①。谢富胜、邓建伟分析了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形成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关系,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协调,就可能出现剧烈的制度变形,影响交易秩序,从而降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影响经济发展。^②

著名学者林毅夫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人为设定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能约束、规范人们的相互行为,帮助他们形成对别人的行动的预期。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即交易费用的节约。制度安排的界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拥有强制力垄断权的组织运用了强制力垄断权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或由经济中的团体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非正式地逐渐形成。前者形成了正式制度,后者形成了非正式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法律规章等安排和道德关系等安排。同样,制度的变迁也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说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它可以纯粹由不同利益集团或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利益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带来正式制度安排的变更,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不一定带来这样的结果。无论何种制度都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一种安排,它至少用于下列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部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也有不同之处。有时,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它往往表现为人的道德观和社会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等,并且常常同意识形态相联系。非正式制度的安排常常是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的,这意味着,正式制度的安排常常落后于非正式制度的安排。^③

① 孔泾源:《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经济研究》1992年第7期。

② 谢富胜、邓建伟:《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相容》,《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陈昕主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4页。

这些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关系助益不小。

由于制度积累与制度权威竞争是笔者的自创概念，因此学术界目前尚无相关研究。而有关帝国官僚制度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

总体来说，有关传统官僚制度研究的文献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类别：第一个类别主要是中国古代的一些官方文件以及资料，如二十四史、历代的会典、明清的实录、《大清律例》等；第二个类别是传统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官僚制度及发生的重要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的一种记载或评述，如《文献通考》、《清史纪事本末》、《二十二史札记》、《皇清经世文编》、《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第三类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于古代历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早期的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中有关变法的论述，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中国通史》、断代史等，近期的如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吴宗国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等；第四类是西方汉学家们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研究，如《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官僚制度研究方面有美国毕汉斯的《汉代的官僚制度》等。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清代一些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离不开清人的笔记。因为这些笔记中多记载了与正式历史相呼应的一些事件的内幕信息及当时社会的现状，而这些信息与现状是研究非正式制度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道咸宦海见闻录》、《佐治药言》、《阅微草堂笔记》等，还有一些有关政府政务处理的实战类辅导书或指南类书籍也十分重要，如《中国师爷名著丛书》、《入幕须知》、《牧令全书》、《幕学举要》、《福惠全书》、《刑钱必览》等。甚至一些清代的官场小说，也能够反映出清代官场的情况。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虽然小说的情节多为杜撰，然而其中的事例仍然能够折射出清代官场的现状。

四、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延续了在轴心制度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的作用在于“克服历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断裂与隔膜，实现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学转向’”。因此，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产生的用意在于弥补政治学研究的不足，而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历史性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正统的历史学研究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事件的组合，历史研究便成为对这些事件的考证与排列组合。“这种披着客观化外衣的历史学不过是把历史撕裂成相互隔绝的碎片而已。与此同时，政治学把政权结构转化为某种范式的对应物，从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回旋中，割裂了现在与过去的相似形和差异性，也导致了政治学陷于了致命的‘解释危机’之中，因为它把丰富的历史过程排除在它的视野之外了。因此，正统史学和正统政治学的决裂刺激了我们寻找联结两者的桥梁，这就是历史政治学的诞生。”^①

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兼有政治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两者有机的结合而具有了新的特点。首先，历史政治学在对历史中的政治事件与政治现象进行描述的过程中，不再是对过去的政治事件的单纯的“白描”，而是对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展开的动因从政治学的角度予以解释、研究。其次，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目的成为了原因的探求，这样既要尊重当时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与现象的客观情况，又不至于单纯的为还原历史事件或现象的原貌而陷入纷繁而零碎的历史陷阱中去。最后，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现象或事件为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各种历史的例证，两者的关系是：政治学解释了历史，历史证明并支撑了政治学理论的判断。我们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则可以说：为了向人们说明 $1+1=2$ 这个道理，我们可以选用两个苹果也可以选用两个香蕉进行具体的说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说明某种理论，而历史成为了说明这种理论最好的例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的理论也为历史事件或现象自身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除此之外，在研究中笔者还综合了比较分析、案例解析等研究方法，力图综合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研究视野来具体地展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权威博弈和制度资本积累竞争。

① 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67 页。

五、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个部分是概念与理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导论部分与第一章。在导论中，主要向读者介绍本书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是怎样提出来的；本书的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研究的文献检视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是本书的理论比较集中的章节，主要围绕本书研究的主要的概念：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资本积累、制度权威竞争、社会—文化人等展开。同时，借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制度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的内涵。第二部分是问题的展开部分，主要包括第二、三、四章，具体地分析清代官僚制度体系内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竞争过程。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概括清代官僚制度的正式制度体系及其制度缺陷，为系统地分析非正式制度做好铺垫。在第三章中，笔者选取了非正式制度体系中的两类制度：权制度和潜规则，具体地论述了清代官僚制度体系内部的非正式制度体系，及其对正式制度体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四章中，通过考察官僚制度的变迁，动态地论证了官僚制度体系内部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侵蚀并进行制度资本积累的四大环节及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体系内三大主要制度领域中取得资本积累胜利的过程。第三部分是本书的结论部分，笔者将对本书的论述做出总结并得出本书的结论。

最后，相信通过作者的努力可以清楚地说明传统官僚制度对帝国政治体系的支撑作用，进而初步地证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权威博弈与制度基本积累竞争的相关理论。